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茶座

【精华本·卷三】

205篇文章优中选精，
58位名家指点江山。



C91-55
20062
3

阅 览

社会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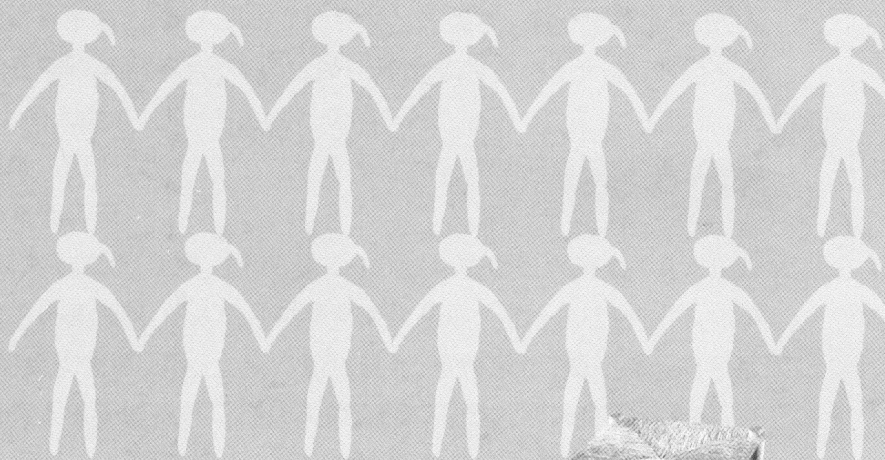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茶座

【精华本·卷三】

205篇文章优中选精，
58位名家指点江山。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 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精华本.卷三 / 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3

ISBN 978—7—209—05665—6

I. 社… II. 张…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996 号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执行主编助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马 洁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06

E-mail:chazuo_shehui@hotmail.com

majie0720@126.com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格 16 开(165mm × 235mm)

印张 25.25 字数 39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定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0539-2925659



读书与行路

古代有狂生，囿于识见，道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后来眼界渐开，始知求取真知，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晚明的文人张岱，就是这么一位。他少年时代“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不想年至半百，遭逢家亡国破，由此痛加反省，才懂得纸上亲闻不如实地亲见。他在《快园道古》中说：“视燕图者言燕，而燕不核也；及至燕，而始能言燕，则空言之无当于实见也。”

近代欧风东渐，让国人引进了社会学与人类学。老一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费孝通等前辈，没有模仿那些没出息的古之士大夫，他们不走“安乐椅上的人类学”、“书斋里的社会学”一路，而强调“实见”的重要，讲究读书思考与田野调查并重。这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重要性已经为人们充分认识。

不过，求取知识，也不一定非得正儿八经地去做田野调查不可。现代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的活动半径大大拓展。无论是旅游也罢，休闲也罢，参加会议也罢，有心人胸中如具灵光，履痕所至，处处都能有所发现。但也有人每天做将要远行状，以为近处不足观；有人足蹬耐克鞋，开着进口豪华车，行旅半中国；有人周游世界，甚至绕了地球不止一圈。可他们却空行了万里路，归来还是大脑空空。他们不懂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键是要有一双社会学之眼，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备穿透表象的洞察力量。无论面对的是荒丘埂莽，残垣断壁，还是帝国胜迹，繁华市井，都能看到常人见不到的东西，真正增长知识见闻。社会学家米尔斯则认为，想象力比观察力更为重要。而要具备这种想象力，就要能“从个人烦恼看出社会议题，结合小我生命和大我生命以及社会结构来思考问题，要打破学科的僵化界限而以问题为中心”，而最最重要的，则是“要将人类的理性与自由，常萦胸际”。

目 录

| 卷首语 |

- 001 王 焱 读书与行路

| 社 会 |

- 001 李 强 帕金的“文化缓冲带”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缓冲带”
- 006 于建嵘 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
- 018 薛 涌 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 024 仇立平 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
- 028 王处辉 不成熟的社会
- 033 倪晓锋 从全民幻想到集体意淫——中国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 039 贾西津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 046 贺雪峰 乡村治理中的“搭便车”问题
- 052 唐 钧 现代社会保障：两个源头和两种模式

| 聚 焦 |

宗教信仰与当下社会

- 054 耿占春 我们可以信奉什么？
- 062 黄夏年 佛教与中国社会——兼谈人间佛教的世俗化问题
- 070 何光沪 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
- 077 高师宁 天主教与新教在中国
- 083 李向平 儒教复兴，谁来埋单？

目 录

反思“经济学帝国主义”

- 090 苏国勋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韦伯的社会经济学
- 099 秋 风 告别“经济学帝国主义”
- 107 王建军 合成谬误的威力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边界
- 114 刘易平 傲慢与偏见——“经济学帝国主义”批判

消费主义与《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 122 许斗斗 时尚消费的辩证冲击力
- 129 王 宁 欲望的起飞与节俭主义——社会双轨化中的欲望与消费
- 137 张 柠 消费社会理论的外围问题
- 143 余碧平 消费空间的重构——读郑也夫先生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 随 笔 |

- 149 朱大可 忧伤的瓦斯
- 152 蒋 蓝 流年已似手中茗
- 155 邓晓芒 生命的尴尬和动力
- 158 穆光宗 “北京人”的文化生态
- 161 唐 逸 食之美
- 163 陈嘉映 快乐三题
- 170 郭于华 少儿不宜百姓不宜官员更不宜
- 174 邵 建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外一篇)

| 社会思想 |

- 178 薛 涌 打捞失落了的古代共和传统
- 187 魏光奇 威权与民主——两种政治社会体制的选择

- 193 陈心想 成王败寇的终结
- 198 赵 峰 社会何以可能?——再思斯密的市场观念
- 207 苏国勋 文化冲突及其后果(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七)
- 212 张小军 二分陷阱与中国本土思想

| 世 相 |

- 216 唐晓峰 原生态社会——洞庭东山实习札记
- 222 郭于华 “鸠占鹊巢”的小插曲
- 225 肖 峰 网络时代的注意力问题
- 232 龙希成 节奏:理解当今社会的一把钥匙
- 238 周振鹤 更重要的是录取公平
- 246 蔡 骐、欧阳菁 粉丝文化——一种社会学的解读
- 252 赵铁林、黄明芳 “爆肚冯”(老北京话城南之十三)
- 265 韦明铤 达坂城的姑娘(《浊世苍生》续写之十)

| 两 性 |

- 272 刘达临 胡宏霞 日本与中国:情色文化的异同
- 277 刘达临 胡宏霞 众口论说性文明
- 285 陈蓉霞 为什么要捍卫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
- 292 方 刚 高收入男子的“性”福生活
- 300 高永平 母亲们开始罢工了——谈社会生育意愿的下降
- 306 留 白 嫁给上帝的男人

| 学术圈 |

- 310 刘绪贻 博学、济世、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 319 刘绪贻 记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位导师
- 326 费多益 生命与乡土——费孝通逝世两周年祭
- 334 陈心想 社会学家的两副笔墨
- 339 吴小英 社会学的季节更替
- 343 文 军 什么是“社会”？——对“社会”的社会学解读

| 文 化 |

- 347 陆 扬 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仇家，还是血亲？
- 352 薛 涌 大学的诞生
- 362 吴万伟编译 决斗的历史
- 370 李洁非 商君的死
- 377 刘庚子 我想写这样一篇博士论文——文明史随想
- 382 郝时远 一方水土一方人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杂记
- 391 赵 峰 关于头发历史的政治经济学

帕金的“文化缓冲带”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缓冲带”

李 强

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是新韦伯主义分层思想的重要代表,他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比如他十分清晰地阐述了韦伯主义的社会屏蔽思想。帕金比吉登斯的年龄要大些,他于1931年出生于英国。他和吉登斯一样都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从1958年至1961年,帕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了三年本科,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的1964~1965年,他曾在吉登斯读书的学校赫尔大学任助理讲师。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到肯特大学(Kent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书,历任讲师、副教授(reader)、教授。1992年他在肯特大学建立了“社会与政治运动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术取向体现了与社会政策、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直到新世纪以来,他仍然参与很多教学和学术活动,曾任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指导教师(tutor)。

在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帕金提出了一个“社会文化缓冲带(a social and cultural buffer zone)”的理论。他认为,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文化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是由大量的低层白领职业群体构成的。大量的社会流动是围绕缓冲带进行的,最上层阶级与最下层阶级之间的流动是很少见的,两极之间距离太远、流动困难,而进入和流出缓冲带的阶级流动则要更容易一些。西方社会的经验证明,社会流动多数是短距离的,也就是说,流动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先进入到这个缓冲带。

帕金认为,缓冲带具有重要的社会稳定功能。由于有了这个缓冲带,社会流动就不会引发明显的社会不适应问题。比如,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向上流动进入了中产阶级下层的缓冲带,在这个缓冲带里,他们的行为模式、所认同的社会符号,就不会与周围有太大的差距。他们就不会显得很不适应,就不会有外来感。所以,大量的所谓社会流动,只不过是边缘阶层进



出缓冲带的流动,是同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发生的边缘地位的流动。

如果父母向下的流动所失去的地盘能够通过子女的成功又重新获得,这样,父母的社会地位下降的感觉就会有所减轻。研究证明,由于他们子女的地位又上升了,那些地位下降的父母心理上得到很大满足。这些先是发生下降流动,后来又在下一代实现了上升流动的家庭,不仅显示了社会的机会,而且也减轻了地位下降所造成的心理紧张。所以,如果将两代人的流动综合起来看,一代人的损失通过另一代人得到补偿,也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阶级之间的流动也可以带来原来阶级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缓冲。研究显示,那些曾经在家庭里有过中产阶级经历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比那些在家庭里没有中产阶级经历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表现要好得多。那些出身于中产阶级但是嫁给工人阶级的妇女,她们在促进子女学习上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科恩(Elizabeth Cohen)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中学生的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曾经是白领家庭出身的,那么孩子中有80%能上大学;而如果母亲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则孩子只有42%上大学。既然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成就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数据就可以证明那些曾经是中产阶级出身,后来下降流动到工人阶级的母亲,其所在家庭的子女具有明显高的上升流动的潜在动力。对此,还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有研究证明,那些通过取得教育成就而流入到非体力职业的工人阶级子女,他们大多是,或者有父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或者是父母处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边缘位置上,而不是来自那种典型的、传统的工人阶级家庭。

各阶级的向下流动,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可以缓和社会紧张,避免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帕金的缓冲带理论是在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一方面有大量的下降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却没有造成危及整个社会体制的政治后果。

帕金认为,从事专业、管理的中产阶级及其子女,他们的下降流动会比下层白领职业成员的下降流动受到更大的文化震惊。体力工人的生活方式、工作经历、报酬水平,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中产阶级特殊地位的人来说,显然需要作出很大的适应调整。在工业社会中,有时确实会发生这种类型的长距离地位下降流动。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拥有专业技术的中产阶级家庭能够保证他们的子女承继某种白领地位。这里所说的承继更多的不是指继承私有财产,而是指提供给子女较好的教育、较好的家庭环境,这些因素有

助于子女的成功。

当然,长距离下降流动,除了个人病理原因、自动放弃等原因外,也不排除竞争淘汰方面的原因。那些出身于富有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也会有人由于能力较弱而落入了报酬很低的体力劳动者行列,但是其比例是十分小的。由于上层阶级子女所获得的在文化、教育、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即便是最为愚钝的人,也可以得到大量的知识、重要的社会技能,因此他们比较容易适应白领的工作。所以,较高家庭地位出身的人,即便是下降,也会有很多缓冲的因素。

总之,长距离下降流动不是主流,主流是进入到邻近的阶级,而“社会文化缓冲带”大大缓解了社会紧张和社会不适应。这就是西方社会得以稳定的重要原因。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笔者认为,近些年来,一方面,我国部分城乡居民确实出现了地位下降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我国当前还是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还属于“大治”之世,与“文化大革命”的“大乱”之世形成鲜明对照。

虽然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很不相同,但是,对于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缓冲带”的原理可以为我们缓解社会危机、缓和社会冲突、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中国目前处在改革与社会巨变的时代,社会流动规模在扩大,速度在加快,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频繁发生。地位上升固然是好事情,但是,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比如迅速富裕起来,也会导致其他群体的相对地位下降。而且在这一时期,地位下降也并不少见,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批城市职工失业下岗,城市出现新的相对和绝对贫困阶层等。传统上,对于地位下降,人们集中于探讨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即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而帕金却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下降流动也可以因为缓冲带的机制而转化为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考虑,我国当前可以探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缓冲带”机制有哪些呢?笔者试列出如下几种。

第一,基层组织“缓冲带”。中国是组织资源最为发达的社会。中国自然资源总量十分丰富,但是最近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短缺,在国际上位次很低。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全世界第88位,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储量仅占世界



的0.7%。所以,从人均的角度看,我们的自然资源是相当贫乏的。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组织资源极为丰富。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建立了层级管理的组织体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市场,通过组织管理和票证制度,居然将物质资源配置到每一个人。当然,这样一种人为配置资源的做法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一般被视为计划经济的严重弊端。但是,如果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看,这又确实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组织资源。长期以来,我们通过这套组织资源实现了极为罕见的社会动员。改革以后,从表面上看,层级的组织管理体系有所弱化,但是,2003年对于突发的“非典”危机的处理,再次证明即使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组织资源仍然是极为强大和有效的。既然有强大有效的组织资源,我们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目前,在社会转型中,与老百姓联系最为密切的组织资源是城市里的街道、社区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等。单从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看,近年来,居委会在辅助城市弱势群体,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照顾老弱病残,建立城市社区医疗保障体系,协助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解决家庭困难、纠纷与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带功能。在全世界,能够像中国这样,通过极为庞大的基层层级街道、社区居委会组织体系实现社会救助的,确实不多见。所以,这应被看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缓冲带。

第二,传统单位体制的“缓冲带”功能。近来关于单位制的探讨大多集中在讨论市场转型时期单位制的变迁和衰落方面,而对于市场转型中单位制为缓和社会矛盾、继续发挥功能方面关注得不够。其实,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转制,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人员激增的时期,单位制还是在发挥作用的,下岗、离岗、内退等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与单位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不少单位在不同程度上为曾经工作过的职工提供了一些福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单位房屋体制改革,将原属于单位的住房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职工。所以,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的自有比率在全世界位居前茅,而居民拥有住房的主要渠道就是“单位房改”。拥有自己的住房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所以,“单位房改”实际上也起到了社会缓冲的功能。

第三,政治身份群体“缓冲带”。在90年代中后期城市体制大转轨中,随着大批国有企业的转制,很多原来处在中间阶层地位上的国企职工经济地

位明显下降。但是,这也分为不同的情况,其中的某些群体,特别是具有传统优秀政治身份的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一些社会照顾和福利,比如,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革命伤残人员、军属、烈属等受到了一些政策的保护。

第四,新的社会保障机制起到了缓冲带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城市里出现的地位下降群体或新的贫困层,国家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保障机制。比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即对城市居民中的贫困阶层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又比如,针对失业下岗,各个城市均建立了多种再就业机制,一些城市提出防止“零就业家庭”的出现,即保证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就业。再比如,近来一些城市尝试在市民中建立“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机制等。

第五,子女地位上升对于父母地位下降的补偿功能。帕金的研究证明,在西方国家,一代人的地位下降,从另一代人的地位上升中得到补偿。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很突出。改革以来,由于产业更替很快,很多中老年群体的技术被淘汰了,出现了明显的地位下降状况,但是,新生代由于受教育水平高、掌握新技术的速度快,因此,出现了某些新生代地位迅速上升的现象。笔者曾将此种现象称为“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即认为改革以前的国营企业职工层在我国当时的社会是类似于中产的阶层,改革以后大部分衰落了,随着国有企业的解体而地位明显下降,但是,年轻的一代却迅速成长起来,所以,家庭中工作不久的孩子的收入明显超过父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里面有明显的代际补偿,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缓冲现象。

第六,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缓冲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同一家庭内部成员的上升和下降流动是很不一样的,常常出现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间,有的人迅速致富,有的人失业下岗的现象。在多数西方国家,兄弟姐妹之间是很少有经济往来的,缺少一种缓冲的机制。而在我国,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金钱帮助是十分普遍的。家庭中一个成员富起来了,父母就会出面调解,让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帮助。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使得下降流动的成员得到了经济补偿,缓解了他们的危机,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缓冲带机制。

总之,下降流动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虽然好的社会体制应该是提供更多的上升流动机会,但是,如果发生了下降流动,也并不可怕。以上的分析就说明,很多因素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可以起到补偿作用。



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

于建嵘

这次能够专程到世界著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演讲,我很高兴。这首先要感谢欧博文(Kevin J. O'Brien)教授,是他及他领导的中国研究中心邀请我到这里的,他们不仅承担了我的全部旅费,而且还精心安排了我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术交流活动。实际上这个演讲最初安排在5月10日,中国研究中心在年初就作了公告。但后来因我5月8日要陪同我们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广东考察,所以没有来。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今天看到有这么多关心中国问题的学生和教授,特别是有这么多美国的著名学者来同我一起讨论中国目前在管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我特别感动。

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我这里所讲的“骚乱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特别的类型。我一直认为,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些事件客观和真实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信息。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1993年,全国共发生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上升了近十倍。如果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分类的话,农民维权约占35%,工人维权为30%,市民维权为15%,社会纠纷为10%,社会骚乱为5%,有组织犯罪等为5%。2005年发生的较大社会骚乱事件约占全年群体性事件的5.1%。

“以法抗争”和“以理维权”

近年来,我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和工人的维权活动。这些研究的主

要成果是两部专著：《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在这两部专著和相关论文中，我把农民的维权活动称之为“以法抗争”，工人的维权抗争称之为“以理维权”。所谓“以法抗争”，是指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我这个“以法抗争”直接来源于欧博文教授和李连江教授所提出的“依法抗争”，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主要有：“以法”是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武器，“依法”是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依据；“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以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以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工人“以理维权”的“理”，不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执政者长期宣扬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执政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真正的统治者。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的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在维权抗争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市民维权的。这方面我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可以称之为“理性维权”。市民维权由于社会阶层复杂，维权的问题主要在物权、环境权及消费权等方面，许多事务是个体的，群体联系有限，运用法律和关系网解决的可能性较多，显得相对理性，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比例较少。目前，由市民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在社区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方面。总之，在我看来，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还是市民的“理性维权”，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

对这个问题,欧博文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有不同的观点。在裴宜理教授看来,中国民众所进行的维权抗争活动,起支配作用的是规则意识,但欧博文教授和李连江教授却提出在规则意识之外,公民权的兴起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维权活动。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说,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行为上,也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前面我分析了中国维权事件,这实际上是近几年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都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可对社会骚乱事件的性质及特点等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所有发生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都称之为社会骚乱。对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只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下面,我结合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影响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来分析这些不同。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极强。同维权事件不同的是,这些事件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就是这样。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的搬运工余某途经太白路中段,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他后面行走的曾姓妇女。随后两人发生争执,曾某打了余某一记耳光,后来曾某的丈夫胡某也冲上前殴打,并自称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都可以摆平。胡某的真实身份是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事件当即引起群众的公愤,造成数百名群众围观,堵塞交通。接着发生砸烧警车的行为,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随后,近万民众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要求政府出面公平处理民工被打事件。民众先后将5辆警车及消防车掀翻后放火焚烧,万州区政府的玻璃大门也被群众扔的石头打碎。群众冲撞区政府办公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再比如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也是因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映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

第二,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无直接利

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骚乱事件区别于维权事件最为主要的特点。前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2005年6月26日14时30分左右，安徽池州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行人刘某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某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接警后，九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将刘某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拟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围观的群众认为警察在袒护打手，袒护商人，要求警察把人交出来。18时左右，围观群众近万人，有人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接着有人开始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鞭炮，引起骚动。随后围观者把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一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接着围观者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火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10余米。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随后，围观者开始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他们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事后查明，这起事件参与者与交通肇事双方都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特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其中，短信和网络的传播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方面，浙江瑞安事件较为典型。2006年8月18日凌晨，浙江瑞安市三中29岁的女教师戴某坠楼身亡，其丈夫及家人以死者受不了教学压力自杀而报案，公安人员调查也认为戴某系自杀，但该校师生都不认同这一结论。网上开始流传戴某是被其夫家谋害，而其夫家是当地亿万富豪，买通了警方等信息。8月20日，瑞安市三中几百名学生自发游行呼吁调查真相，学生们发表公开信。9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作出尸检报告，认定戴某系精神抑郁症发作，引发夜间跳楼自杀。9月6日，因民众怀疑在塘下韩田菜场有人用贿赂的方法获取支持定案自杀的签名而引发众怒，塘下韩田菜场被围困。下午2时左右，警方开了二十几辆警车，特警队的人全副武装，拿着电棍、盾牌等，往人群中扔催泪弹，驱散人群。但在此期间，各种关于公安人员被买通的短信和网络信息在当地传播，号召民众游行示威。9月7日上午，数千市民按短信要求再次组织几批人分别游行到塘下镇政府和塘下派出所抗议，并